

中德文化丛书
叶隽 主编



清廷外交大臣如奕訢、文祥、李鸿章以及总署大臣的观念嬗变过程，都在德国外交官的笔下得到生动而准确的呈现，比之中文文献里的攻讦甚至谩骂，德语文献里的清朝重臣们得到德国同行的一致赞扬，这说明了什么？

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

◎(德)艾林波 巴兰德等著
◎王维江 吕澍 辑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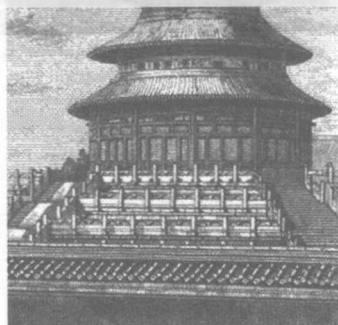
D829.516
A360

◎(德)艾林波 巴兰德等著
◎王维江 吕澍 辑译

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



郑州大学 *04010796307.*



清廷外交大臣如奕訢、文祥、李鸿章以及总署大臣的观念嬗变过程，都在德国外交官的笔下得到生动而准确的呈现，比之中文文献里的攻讦甚至漫骂，德语文献里的清朝重臣们得到德国同行的一致赞扬，这说明了什么？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D829.516
A36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 / (德) 艾林波, 巴兰德等著; 王维江, 吕澍辑译.
—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8

(中德文化丛书)

ISBN 978-7-5334-5904-8

I. ①德… II. ①艾… ②巴… ③王… ④吕… III. ①中德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史料 - 近代 IV. ①D82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1465号

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

(德) 艾林波 巴兰德等 著 王维江 吕澍 辑译

-
-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 出版人 黄旭
- 发行热线 010-62024258
- 印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黄村镇三间房村委会北500米 邮编: 102600)
- 开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 印张 23.5
- 字数 356千字
- 插页 2
- 版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5334-5904-8
- 定价 49.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62024258, 0591-83752790)联系调换。

“中德文化丛书”总序

叶 隽

一、中德两国在东、西方（亚欧）文化格局里的地位

华夏传统，源远流长，浩荡奔涌于历史海洋；德国文化，异军突起，慨然跃升于思想殿堂。作为西方文化、亦是欧陆南北对峙格局之重要代表的德国，其日耳曼统绪与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文化颇多血脉关联，而与华夏文明恰成一种“异体”态势，这可谓“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为欧陆南方拉丁文化代表之法国，恰与中国同类，故陈寅恪先生谓：“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诚哉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国人的传统、风俗与习惯确实与中国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当然也不排除文化间交流的相互契合：诸如科举制的吸纳、启蒙时代诸子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接受等皆是。如此立论，并非敢淡漠东西文化的基本差别，这毕竟仍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分野；可无论是“异于中国”，还是“趋于中国”，均见钱锺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

在亚洲文化（东方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中国文化属于北方文化，印度文化才是南方文化。中印文化的交流史，实际上有些类似于德法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属于地缘关系的亚洲陆地上的密切交流，并由此构成了东方文化的

核心内容。因为，两种具有互补性的主导性文化，往往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较快推进，这可能是一个基本规律。遗憾的是，由于地域太过辽阔，亚洲意义的南北文化交流有时并不能相对频繁地形成两种文化之间的积极互动态势。

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欧洲三强英、法、德各有所长，可若论地缘意义上对异文化的汲取，德国可拔得头筹。有统计资料表明，在将外语文献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国居首。其中对法国文化的吸收更成思想史上一大公案，乃至一口流利法文的歌德那一代人，因“过犹不及”而不得不激烈反抗法国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无论正反事例，都足证德意志民族“海纳百川”的学习情怀。就东方而言，中国文化因其所处地理中心位置，故能得地利之便，尤其是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汲取，不仅是一种开阔大度的放眼拿来，更兼备一种善择化用的创造气魄，一方面是佛教在印度终告没落，一方面却是禅宗文化在中国勃然而起。就东方文化之代表而言，或许没有比中国更加合适的。

中德文化关系史的意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全局眼光中才能特别凸显出来。即这是一种具有两种基点文明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交流，而非仅一般意义上的“双边文化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东西文化内部的两种核心子文化的交流，即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条顿文明与亚洲北方文化的华夏文明之间的交流。这样一种主导性的文化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二、作为文明进程推动器的中德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的“超人三变”

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是文明进程的推动器。诚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这一论断，也早已为第一流的知识精英所认知，譬如歌德、席勒那代人，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走向世界、汲取不同资源的重要性，而中国文化正是在那种背景下进入了他们的宏阔视阈。当然，我们要意识到的是，对作为现代世界文明史巅峰的德国古典时代而言，文化交流的意义极为重要，但作为主流的

外来资源汲取，是应在一种宏阔的侨易学视域（此概念作者将专文论述，此处不赘）中去考察的，这一点歌德总结得很清楚：“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他们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此处涉及文化交流的规律性问题，即如何突出作为接受主体的主动选择性，若按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不仅是中國精英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资源的态度，推而广之，对各国择取外来资源与创造本民族之精神文化，皆有普遍参照意义。总体而言，德国古典时代对外来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汲取与转化创造，是一次文化交流的质的提升。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意义在此。

至于其他方面的双边交流史，也同样重要。德印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德国学者涉猎较多且深，尤其是其梵学研究，独步学林，赫然成为世界显学，正与其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相吻合。而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第一流学者，如陈寅恪、季羡林等就先后负笈留德，所治正是梵学，亦可略相印证。中法文化交流史同样内容极为精彩，由启蒙时代法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汲取与借鉴到现代中国发起浩浩荡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转易为师的过程同样值得深入探究。总之，德、法、中、印这四个国家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应当归入“文化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之列。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或多或少会将关注的目光更投入到中国问题本身。必须加以区分的是所谓“古代中国”、“中世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概念分野。“古代中国”相当于传统中国的概念，即文化交流与渗透尚未到极端的地步，尤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核心；“中世中国”则因与印度佛教文化接触，而使传统文化受到一种大刺激而有“易”，禅宗文化与宋儒理学值得特别关注；“现代中国”以基督

教之涌入为代表，西学东渐为标志，仍在进程之中，乃是以汲取西学为主的广求知识于世界，可以“新儒家”之生成为关注点。经历三变的中国，“内在于中国”为第一变，“内在于东方”为第二变，“内在于世界”为第三变，三变后的中国，才是具有悠久传统而兼容世界文化之长的代表性文化体系。

先秦儒家、宋儒理学、新儒家思想（广义概念）的三段式过渡，乃是中国思想渐成系统与创新的标志，虽然后者尚未定论，但应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思想的努力方向。而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代表性且兼具异质性的交流，在数量众多的双边文化交流中，具有极为不俗的意义。张君勱在谈到现代中国的那代知识精英面对西方学说时的盲目时有这样的描述：“好像站在大海中，没有法子看看这个海的四周……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它们的历史，其中分若干种派别，在我们当时加紧读人家教科书如不暇及，又何敢站在这门学问以内来判断甲派长短得失，乙派长短得失如何呢？”这其中固然有个体面对知识海洋的困惑，同时也意味着现代中国输入与择取外来思想的困境与机遇。王韬曾感慨地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不仅表现在政治军事领域如此，在文化思想方面亦然。而当西方各强国纷纷涌入中国，使得“西学东渐”与“西力东渐”合并东向之际，作为自19世纪以来世界教育与学术中心场域的德国学术，则自有其非同一般的思想史意义。实际上，这从国际范围的文化交流史历程也可看出，19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

故此，第一流的中国精英多半都已意识到学习德国的重要性。无论是蔡元培强调“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还是马君武认为“德国文化为世界冠”，都直接表明了此点。至于鲁迅、郭沫若乃至蒋介石等都有未曾实现的“留德梦”，也均可为证。中德文化研究的意义，端在于此，而并非仅仅是众多“中外文化交流史”里的一个而已。如果再考虑到这两种文化是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方文化之个体（民族—国家文化），那么其意义就更显突出了。

三、在“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关联背景下理解中德文化关系的意义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画地为牢，因为只有将视域拓展到全球化的整体联动视域中，才能真正揭示规律性的所在。所以，我们不仅要谈中国文化的西传，更要考察波斯—阿拉伯、印度、日本文化如何进入欧洲（西方）。这样的东学，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东学。当东学西渐的轨迹，经由这样的文化交流史梳理而逐渐显出清晰的脉络时，中国文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比较格局中，才会更清晰地彰显其思想史的意义。这样的工作，需要学界各领域研究者的通力合作。

而当西学东渐在中国语境里具体落实到20世纪前期这辈人时，他们的学术意识和文化敏感让人感动。其中尤其可圈可点的，则为1930年代中德学会的沉潜工作，其标志是“中德文化丛书”的推出，这其中不仅有《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这样的系统翻译工程，也包括《中德学志》等刊物的学术功用……至今检点前贤的来时路，翻阅他们留下的薄薄册页，似乎就能感受到他们逝去而永不寂寞的心灵。昔贤筚路蓝缕的努力，必将为后人开启接续盛业的来路。光阴荏苒，竟然轮到了我们这代人。虽然学养有限、社会功利，但对前贤的效慕景仰之心，却无有或减。如何以一种更加平稳踏实的心态，继承前人未竟之业，开辟后世纯正学统，或许就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不过我仍要说我们很幸运，当冯至、陈铨那代人不得不因了民族战争的背景而辗转颠沛于流离战火中时，一代人的事业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宣告中断”时，我们却还有可能静坐于书斋之中。虽然市场经济的大潮喧嚣的似也要推翻学院里“平静的书桌”，但毕竟书生还有可以选择的权利。在清苦中快乐、在寂寞中读书、在孤独中思考，这或许，已是时代赠与我们的最大财富。

所幸，在这样的市场大潮下，能有出版人的鼎力支持，使这套“中德文化丛书”得以推出。我们不追求一时轰轰烈烈吸引眼球的效应，而希望

能持之以恒、默默行路，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长期积淀略有贡献。在体例上，丛书将不拘一格，既要推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著述，亦要译介国外优秀的学术著作；就范围而言，文学、历史、哲学固是题中应有之义，学术、教育、思想亦是重要背景因素，至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鲜活的社会科学内容，也都在“兼容并包”之列；就文体而言，论著固所必备，随笔亦所欢迎；至于编撰旧文献、译介外文书、搜集新资料，更是我们当学习德国学者，努力推进的方向。总之，希望能“水滴石穿”、“积跬步以致千里”，经由长期不懈的努力，将此丛书建成一个略具规模、裨益各界的双边文化之库藏。

引言

本书是计划中的“德语文献中的晚清城市”的第二本，第一本《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已于200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北京是清廷的首都。按照清帝的观念，外邦来见天朝上国，欢迎进入首都，不肯跪拜的西方列强则被拒之千里，由此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是：皇帝北狩身亡，首都被占领，圆明园被焚毁，好脸面的天朝上国被迫签订城下之盟。

德意志的官方外交特使团正好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启程来华，试图效法英法，与清廷签订条约。至1861年9月签约成功，清廷总算维护住了脸面，因为签约的地点是在天津，不是北京，尽管德意志外交特使团设想的签约地点是北京而非天津。而签约之后，使节驻京已不可避免。本书的前四篇即为特使团成员以私人身份在北京游览的相关记录。这些记载，凸显近代中国的羁縻术与欧洲外交术的相遇与冲突。

随后，德意志的外交官得以驻节北京，本书的第五篇、第七篇、第十三篇即为驻华德国外交官的记录。时间跨度为四十年，直到1900年的庚子之变。清廷外交大臣如奕訢、文祥、李鸿章以及总署大臣的观念嬗变过程，都在德国外交官的笔下得到生动而准确的呈现，比之中文文献里的攻讦甚至谩骂，德语文献里的清朝重臣们得到德国同行的一致赞扬，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相关朝廷大臣并不

缺乏了解和学习西方的胸怀和能力，但四十年来，外交越办越坏，国运越来越不济，恐怕不能再以“两半”（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论来搪塞，因为这四十年，还伴随着开放度不小的富强运动。历史证明，富而不强的同光中兴无法融入日益呈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也无法挽回衰亡的国运。德意志外交官的相关记载，或许能为解释这一怪异的历史过程提供克罗齐所强调的“凭证”。

其余诸篇是商人、银行家、报刊记者、汉学家来华游历的观感。令人再度吃惊的是，他们对大清帝国治下的人民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敬意，对有着千年积累的中国文化更是钦佩不已；当然，抨击清廷的腐败、官员的自大，他们也不留情面。历史的面相，绝非是“侵略者”或“殖民者”所能涵盖。

既然近代中国的重大命题是近代化，那么，已经近代化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看法自然不应忽略。如果我们承认从观念到技术诸层面清廷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那么，我们从观念到技术上的应对措施就应该得到历史从业者的细致检视。外语文献正是不能再视而不见的检视“凭证”。这正是本书出版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感谢汉堡大学的傅敏怡（Prof. Dr. Michael Friedrich）教授的无私帮助，他一直无偿为我们提供珍贵的德语文献。感谢他的学生滕可欣（Kristina Tretiak）女士、Ennomoto女士、谭克家（Christian Textor）先生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把这些珍贵的图书制作成PDF版本，这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够专心致力于文字的翻译。

感谢学友洪庆明先生、叶伟敏先生和敝所同仁甘慧杰先生、葛涛先生，为我们解决了文本中的法文和日文的句子翻译问题。熊月之先生一直关心着拙译的翻译和出版，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对本丛书的主编叶隽先生和承印单位福建教育出版社北京八本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副总编陈之川先生表示敬意。在有书无钱莫进来的学术书出版潜规则横行的时代，他们对学术翻译的敬畏和支持，让我们感到温暖。

王维江、吕澍

2012年6月10日于沪上

目录 | CONTENTS

引 言 1

第一篇 1861：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报告中的北京 1

第二篇 1861：特使艾林波书信中的北京 73

第三篇 1861：商业代表斯庇思游记中的北京 93

第四篇 1861：随船牧师柯艾雅日记中的北京 103

第五篇 1864：领事拉度维茨书信中的北京 116

第六篇 1868：丝绸商人克莱尔游记中的北京 128

第七篇 1861-1893：公使巴兰德回忆录中的北京 153

第八篇 1886：银行家恩司诺经济报告中的北京 185

第九篇 1890-1891：使馆翻译生佛尔克书信中的北京 220

第十篇 1898：记者高德满报道中的北京 249

第十一篇 1888-1889、1894-1895：汉学家福兰阁回忆录中的北京 290

第十二篇 1898：记者海司报道中的北京 313

第十三篇 1900：奥地利公使讷色恩夫人回忆录中的北京 335

第一篇

1861：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报告中的北京

[译者案语]

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未结束，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的武装船队已行进在东亚途中，其首个目的地为日本。出师不利，眼看就要靠岸，凶猛的台风掀翻了单桅帆船“Frauenlob”号，41名船员葬身海底。1860年8月抵达日本，此时日本国内矛盾尖锐，闭关锁国一派势力强盛，浪人四处游荡，袭击外国人。就在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在日谈判期间，俄国的一名海军军官和一名水手被暗杀，美国驻日公使借给普鲁士人的荷兰语翻译被暗杀。经历了150余天的艰难谈判，普鲁士特使团于1861年1月与日本签署了通商条约。

带着与日本交往的经验教训，特使团于1861年3月来到上海，他们遇到了与日本谈判同样的外交难题，中国官场的保守气氛浓厚，就连在开放最前沿的上海道台对特使团的工作也不予协助：“然而抚台却漫不经心地表示，这趟使命将会遭遇很多困难。因为他们认为，大大小小的条约都是中国的灾难，引起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参见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0页。以下书名简注为《另眼相看》）比之日本人直接而猛烈的排外，中国官员的羁縻术，让普鲁士人更觉棘手。

普鲁士外交特使团选择了一个尴尬的时间，抵达了一个尴尬的地点，试图完成

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

一件对于清朝政府而言极为尴尬的使命：圆明园的大火刚刚熄灭五个月，太平军的战火则正在南方燃烧；清廷力图以传统羁縻之术，把普鲁士人拴在上海，而普鲁士人早已悟得破解羁縻术的要诀——北上。但特使团要把想法付诸实践，亦非易事，其外国同僚英、法公使认为与清政府谈判的时机未到，他们害怕普鲁士人的到来会刺激清朝高官大吏的神经，由此损害到自己在刚刚过去的战争中获得的好处，故建议“艾林波伯爵还是应该再等八到十个月，直到获得清政府的信任为止”。特使团团长艾林波已见识过日本人的拖延外交术，他不愿浪费时间，而是选择了速战速决的策略，立即离沪北上。在天津，谈判异常艰难，艾林波只得派巴兰德强行入京，选址租房，引起朝廷震怒，恭亲王不得不出面干涉，最终逼迫其撤退。但这一冒险行径确实也推动了在天津的谈判，双方终于在同年9月2日与清廷的谈判代表崇纶、崇厚签署了中普通商条约。而且通商条约除了适用于普鲁士之外，还包括关税同盟所属的二十余国。中普通商条约谈判比日普通商条约谈判多花了两个月时间。

按照双方协定，即使通商条约正式签订，德国公使驻京也推迟到五年之后实行，换句话说，1861年的特使团没有权利以官方名义前往北京。到了中国而未到北京，无疑是一趟不圆满的旅程，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俄国公使巴留捷夫以私人名义邀请艾林波使团游览北京，不仅圆了使团的梦，同时也消解了清廷的尴尬。那位心态开放的恭亲王以私人名义接待了艾林波，为中、普两国的交往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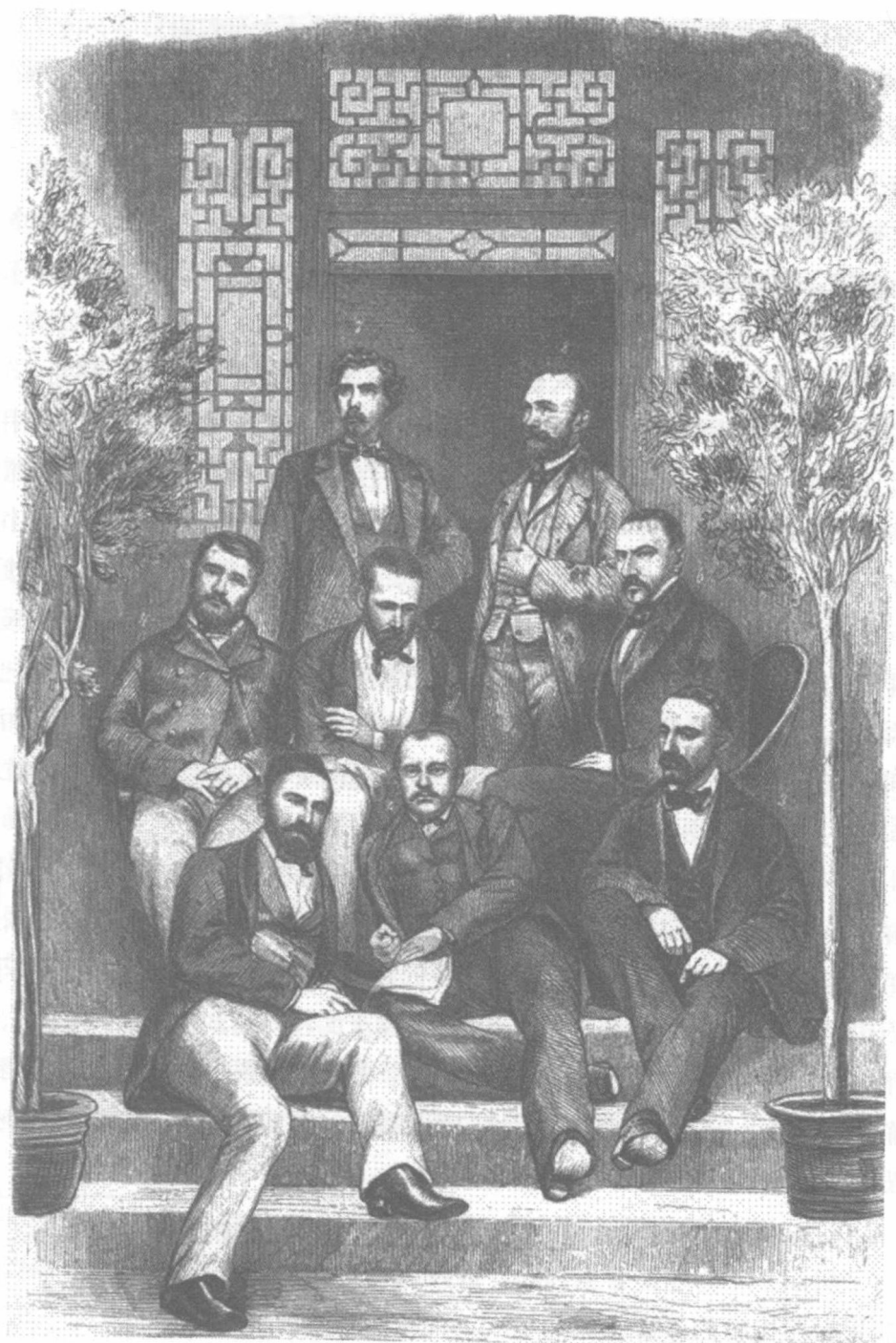
正因为此次游历京城的背景特殊，考察报告的笔墨大多花费在了对北京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述上。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城市改造和近些年的商业化房地产大跃进，再阅读普鲁士特使团笔下的北京风物人情，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肃顺、奕訢、文祥、桂良、崇纶、恒祺、胜保……还有西方驻京使馆和海关的头面人物，如布鲁斯、威妥玛、赫德……都在考察报告中呈现出活灵活现的面貌，由此他们的思想、行为也就落在了一个可以解释和理解的平台上了。

在那样一个繁杂纠结的六十年代，在那样一场众说纷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双方的意图、误解和最后的结果，同样呈现在“局外人”普鲁士使团的考察报告里，这为今天的历史从业者了解那一时代提供了新的证据和审视角度。

有关普鲁士外交特使团的背景、船只装备及人员组成情况，读者诸君可参阅拙译《另眼相看》第一篇及第二篇的“译者案语”，此处不赘。

文中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特使团成员在天津的合影（根据照片绘制）

6月21日清晨，我们骑马从天津出发，三辆骡子大车拉着行李，一个传令兵、一个中国马夫加上巴兰德（von Brandt）先生的仆人阿忠（音）跟在车后。明亮的太阳冉冉升起，照在还浸润着露水的大地上，高粱、大麦、蓖麻、大蒜和各种各样的绿色蔬菜，都沐浴在柔和的阳光里。太阳渐渐升高，炙烤着没有树荫遮蔽的道路，只有村庄里才有树木。道路大多沿着白河的高高河堤，路况很好，每隔大约一英里就有一个茶馆，路人可在里面歇脚。我们没有看见可以打猎的动物，只看见成群的小鸟，特别是喜鹊，给行旅带来趣味和生机。很多做生意的人也在往天津走。我们骑着马，一会儿赶到大车前面、一会儿又落到后面。一口气走了约四英里，我们来到了杨村，这里用泥土和木头垒起的小屋，肮脏不堪，扎堆挤在白河的右岸，窄小的巷子穿横其间。我们在那里吃了早饭，趁着这一天中最热的时候，睡了一觉。在茶馆的长长的院子里，满是漂亮的大车和马槽，农家房舍的污浊以及害虫，还算可以忍受。如果不是看见辫子，都不会觉得是在中国，因为村子里没有一点中国的样子，建筑样式和布局没有一点艺术性，简陋不堪，是乡下人用泥土和木头做出的满足最基本需求的东西。很少能见到庙宇的飞檐从一片灰色中伸出来。我们自己带着酒、面包和肉，茶馆提供茶、蛋和杏子，还有冰镇饮料用的美妙冰块儿。

下午三点半，我们继续上路，晚上抵达河西务，这是白河边上一个小镇，到处都是花园，河边长满树木，它距离杨村将近五英里。1860年秋天，联军曾到过这里，发现它已是空镇，便气急败坏地加以摧毁，很多房屋成了瓦砾堆。我们旅店的大院子外，围着一圈露天的牲口棚，很多骡子在那里，而赶车的就睡在其中，大车则停满了院子。晚餐吃的东西跟在杨村一样。我们睡得很少，因为每个房间对着牲口棚，牲口叫着互相乱咬，赶车人整夜吵骂不停。一切都那么脏，地上什么都有。

6月22日，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就上了马。道路变得好看起来，也有了树荫，不时还能瞥见白河。被毁的马头镇一片灰暗，我们在一家旅店里做了短暂的停留。1860年秋天联军往北京进军的时候，英国士兵自作主张，外出抢劫，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遭到枪击，有人受了伤。贺布

(Hope)^①爵士命令把这个村子扫平，可是谁也搞不清到底是哪个村子，那个被派遣的军官就决定，把附近最富最好的地方烧掉。不幸就这样降临到马头镇，大火让上千个无辜者倾家荡产。根据英国军官的报告^②，他们把自己的同伴未能找到应该承担罪责的人却烧毁另一个镇子的事情，称为整个战事中最大的笑话。印度骑兵团的一个年轻人狂热地描写了他在枪刺手无寸铁的居民时内心的快感。这是在通州谈判破裂和张家湾战役之前发生的事情。

过了马头镇，道路与白河最后一次接触，然后就穿过肥沃的田野通往张家湾，这里是1860年战役后又遭到抢劫的小城。有一条很窄的、有时会溢出河岸的小溪从这里通向白河，干燥的草地上有一座方石造的古桥。

我们在张家湾吃了午餐，一点半继续上路。从农田作物上判断，这里的地势比较高，我们看见的是荞麦和大豆。路上越来越热闹，庙宇和墓碑也频频遭遇。漂亮的榆树、柳树和槐树，为众多的村庄盖上了绿荫，村庄里的喧闹也让人意识到，这儿已是大城市的附近。灰尘和热浪扑面而来，马行进在深深的沙土中。飞扬的尘土遮住了视线，看不见守城的卫兵，我们在五点半钟通过了外城的东门，进入北京，未受阻拦，继续前行。赶车人应该把我们带到中国旅店，从新加坡开始就跟着我们的阿忠，很容易听懂我们的指令，但是他说的南方话，人家听不懂，简直像是在说德语，而我们又没有别的翻译。结果赶车人把我们带进了内城，来到了英国公使馆前，他以为我们要住在这里。最后终于让他明白了，我们掉头回到外城的大街上^③，街边好多人向我们招手，招徕我们到房子里去。他们忙碌地把我们的行李搬到了后面房子的楼上，殷勤问候，端上了茶、杏子、奶和冰——这些都是我们很想要的东西，丰富了我们原

①Sir James Hope (1808-1881)，另译名为何伯。出身于英国海军世家，1859年任东印度及中国舰队司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率舰队攻占大沽炮台。

②S. Rennie, *Peking and the Pekinese* I. 15.——原注

③因为先前在天津的英国公使极力劝说德国人不可进京，所以巴兰德一行要避免在北京见到英国人。